

C-E Translation of Cantonese Culturally Loaded Words from a Perspective of Eco-Translatology

ZHAI Qiulan SHAN Xinrong

Guangzhou College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Received: February 8, 2023

Accepted: March 8, 2023

Published: June 30, 2023

To cite this article: ZHAI Qiulan & SHAN Xinrong. (2023). C-E Translation of Cantonese Culturally Loaded Words from a Perspective of Eco-Translatology.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 (2), 196–202, DOI: [10.53789/j.1653-0465.2023.0302.020](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3.0302.020). p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3.0302.020>. p

The present study entitled “C-E Translation of Cantonese Culturally Loaded Words from a Perspective of Eco-Translatology” is supported by Guangdong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oject (2022) with No. 2022WTSCX146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Translation Talents Assessment Project of China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with No. FYYJ013.

Abstract: According to eco-translatology, a translator, the focus and crucial part in a translation eco-translation chain, should adapt fully to the translation environment, which contains a series of elements including languages, societies, cultures, economy, communication and so on. Moreover, the translator will make a proper choice in constructing a translation in the target language. In the above-mentioned process of adaption and choice, eco-translatology claims that linguistics,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are the three dimensions which the translator is expected to consider about.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current existing situation and eco-translation environment and, then makes a tentative translation of some Cantonese culturally loaded wor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translatology and of interpreting translators' responsibilities. The article claims that only if achieving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linguistics,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the translator can provide the best translation version. Hopefully, the translation study based on eco-translatology will provide academic support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words: Eco-Translatology; Cantonese culturally loaded words; translator; choice; adaption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s: ZHAI Qiulan obtained her master's degree specializing in Foreign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from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China. She is currently a teacher at Guangzhou College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SHAN Xinrong is the Dean of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zhou College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lding a master's degree with academic interest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生態翻譯學視域下的粵語文化負載詞英譯

翟秋蘭 單新榮

廣州應用科技學院

摘要:生態翻譯學強調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中心」地位,認為譯者需要適應生態翻譯環境,進而在目標語中選擇譯文。翻譯生態環境不單純指的是語言環境,更包括了社會、文化、經濟、交際等各方面的來源語言世界和目標語世界。生態翻譯學的翻譯原則是一種集多維度的選擇性與適應性選擇於一體的方法,即,語言維、交際維、文化維(簡稱「三維」)轉化。立足於當今國際大環境和國家相關方針政策,本文基於生態翻譯學的視角描述了粵語文化負載詞的生存狀況和翻譯生態環境,並選取了典型的粵語文化負載詞為實例,闡釋如何從三維轉換的角度進行英譯和踐行譯者的責任,指出譯者只有做到「三維轉換」才能達成最高程度的整合適應選擇度,進而得到最佳的譯文;期冀基於生態學視域的英譯研究能為傳播中國傳統文化提供學術支撐。

關鍵詞:生態翻譯學;粵語文化負載詞;譯者;選擇;適應

基金專案:廣東省教育廳 2022 年度高校認定類專案「新文科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應急語言服務人才協同培養模式研究」(專案編號:2022WTSCX146);2022 年度中國外文書局翻譯院國際傳播與翻譯人才評價國際化研究課題「應用型翻譯人才培養模式創新研究」(專案批准號:FYYJ013)

一、引言

文化自信是中國在世界軟實力競爭中的基石之一,也是中國為建設和平安定的世界格局的信心來源之一;新冠疫情以來,中國力量、中國文化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新時代顯現出的這些特徵共同構成了譯者從事翻譯活動時的生態翻譯環境。作為翻譯活動的主體,譯者如何在該生態翻譯環境中適應和選擇、充分意識並展現自身的譯者責任,同時擔當踐行文化自信的主體角色,關乎到能否構建一個健康和諧的翻譯生態鏈,進而助力中國展現大國文化風采與自信,並讓中國文化成為和平交流溝通的媒介。粵語文化負載詞蘊育於中國傳統文化,有效的粵語文化負載詞英譯有益於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然而對於其學術研究並不全面和深入,首先這表現在和粵語文化負載詞英譯相關的學術文章數量不多,其次其英譯策略缺乏系統的理論支撐,多從歸化異化角度提出翻譯策略,並沒有系統的理論基礎。本文以生態翻譯學為理論基礎,考察了目前粵語文化負載詞的生存狀況、翻譯生態環境,並從生態翻譯學的角度提出可行的英譯策略,指出譯者應該如何踐行譯者責任,促使譯文與生態系統和諧統一。

二、粵語文化負載詞生存狀況及翻譯生態環境

(一) 粵語文化負載詞的生存狀況

1980 年,許國璋先生發表了 *Culturally loaded words and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一文,提出了

culturally loaded words(文化負載詞)的概念,也給中國外語界拉開了詞語文化差異研究的序幕;該文的觀點和視角具有里程碑的歷史意義,為後人在翻譯、跨文化交際等相關領域奠定了理論基礎。文化負載詞是具有隱藏文化含義的詞語,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粵文化擁有源遠流長的歷史、也是中國傳統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作為粵文化的典型代表和漢語的重要方言,粵語對漢語普通話和英語均有較為明顯的植入影響,例如「美女」一詞已成為當下普通話中頗受歡迎的社交稱謂語,其形成深受粵文化中「靚女」一詞作為社交稱謂語的影響;又如英文中大量的、原本屬於對應空缺的詞彙,「dim sum」、「wonton」、「ketchup」、「bok choy」、「chow mein」等等亦早已成為英語中的一部分,豐富了英文詞彙量。同時,粵文化對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實施和推進也有其特殊作用,特別是「建設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和「共建人文灣區」,粵港澳三地文化同根同源,保護和弘揚粵文化不僅是增進三地民眾文化認同之舉,更是增強中國文化凝聚力的表現,是中國在世界多元文化競爭中的一抹亮色。本文所錨定的粵語文化負載詞是指粵文化中能直接或間接表達粵語文化的詞語,比如,「艇仔粥」、「鑊耳屋」、「灰塑」、「河南」、「沙灣飄色」等等,它們廣泛地存在粵文化的產品、實踐、團體、人物、意識形態等不同維度之中,更密切地融入到了人們的衣食住行中,傳遞了濃郁的粵文化色彩。隨著中國人民文化自信的不斷增強,粵語文化負載詞更是吸引了學者們的目光;以粵語文化負載詞「鑊耳屋」為例,根據知網統計,2008-2011年間,僅兩篇相關文獻;而2017-2022年間,以鑊耳屋為主題的相關學術文獻累計16篇,其中僅2022年一年共計7篇相關學術文獻。

(二) 粵語文化負載詞的翻譯生態環境

生態翻譯學將原文、譯者和譯文視為翻譯生態環境。以下圖1所示,虛線框內即為翻譯生態環境。



圖1 翻譯生態環境

同時,原文、譯者和譯文三者背後所衍生的語言、文化、交際、社會、讀者、委託者、評論者等等均可被納入翻譯生態環境。本文在考察粵語文化負載詞的翻譯生態環境時,將譯者、讀者、委託者、評論者等歸為主觀翻譯生態環境,將原文、譯文、社會、交際、語言等歸為客觀翻譯生態環境。

首先,主觀生態翻譯環境。除了上文中所陳述的國際大環境的嬗變、國家方針政策的支持以外,廣州地方政府歷來十分注重廣州的文化建設工作。早在2012年,前任市長陳建華在十四屆人大一次會議舉行的市長記者招待會上談及關於廣州的三個夢想,第一個夢想即為爭創廣州歷史文化名城的新輝煌;溫國輝市長在2018年市十五屆人大三次會議荔灣區代表團分組會議中指出「推動文化產業發展和歷史文化保護」;2015年,廣州市政府正式對廣州民俗博物館進行建設,並於2017年年底竣工;荔灣區旅遊推廣中心曾向廣大市民推出「西關美食譯名大徵集」的活動,為「艇仔粥」、「娥姐粉果」、「竹升面」、「幹蒸」、「腸粉」等特色廣州小吃和「蓮香樓」、「陶陶居」等老字型大小茶樓徵集譯名,據相關負責人介紹,過去飲茶點心的英文名多數由酒樓隨便翻譯,多數用拼音直譯,這樣就算服務員手腳並用,也很難向非母語顧客解釋清楚地道廣州小吃到底是什麼。此外,隨著互聯網和新媒體的發展,許多文化愛好者也通過視頻號和抖音等方式積極傳播粵文化,對粵文化的保護和傳承也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其次,客觀生態翻譯環境。粵語文化負載詞的客觀生態翻譯環境可用利弊共存來形容。有利於其生存和發展的要素包括後疫情時代世界格局轉變,中國文化的厚重與包容,國家政策對大灣區發展的促進,廣東



地區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更是對外進行經濟、文化、科技交流的視窗,各級政府、機構、學術團體等對粵文化的保護、研究和資助等等。然而不利於其生存和發展的生態翻譯環境則包括目前粵文化中的諸多項目均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非遺」並不是一種「榮耀」,更是一種對瀕臨滅絕的「警示」和記錄留住的「責任」;同時,諸多粵語文化負載詞英譯不統一,以廣州美食和廣州景點中的文化負載詞為例:首先,廣州小吃「娥姐粉果」。相傳在明代,廣州某官僚雇傭的娥姐把曬乾的大米飯磨成粉,用開水和麵做皮,以炒熟的豬肉、蝦、冬菇、竹筍末做餡料,包好上蒸籠蒸熟,稱為粉果。目前「娥姐粉果」至少有三種不同的譯法:「Ejie Fenguo」、「Lady E's Dim Sum」、「Steamed Dumplings with Pork, Mushroom and Bamboo Shoots」。又如家喻戶曉的「艇仔粥」,在廣州市人民政府官網的英文版中其譯文為 Sampan Porridge, 百度百科上英文為 Boat son porridge, 其他五花八門的譯文,如 Assorted seafood congee with peanuts, Tingzai porridge, Mixed seafood congee 等來自各種渠道,包括酒樓餐廳的功能表和英語學習網站等等。其次,廣州景點名稱的英譯。白雲山景區的摩星嶺是白雲山的最高峰,是白雲山三十多座山峰之首,得名于康熙修《廣東志》描繪白雲山圖時,在其卷首稱此山峰為「摩星嶺」。然而在白雲山景區的官方網站英文版中,出現了三種不同的英譯:Moxingling, Moxing Ridge, Moxing Summit。又如又如「陳家祠」的英譯也不盡相同。陳家祠地鐵站和公交站的英譯為 Chan Clan Academy, 景點指示牌的英譯則為 Chen's Lineage Hall, 導遊地圖上的英譯又變成了 The Chen Clan's Academy, 網路上的英譯又包括 Ancestral Temple of the Chen Family, Chan Clan Temple 等。不同的譯文反映了不同的譯法,不同的譯法根植于不同的翻譯策略,而不同的英譯策略反映了譯者所意識到的和所踐行的譯者責任不盡相同。譯文無法呈現文化負載詞的信息量,這無疑對粵文化的保護和對外交流毫無裨益,只有建立統一、合理、標準的翻譯規範,粵文化在翻譯的過程中才能煥發生命、為跨文化交流做出貢獻,並為不斷湧現出的、由新興文化孵化的新民俗文化提供翻譯規範參照。

三、粵語文化負載詞的譯者責任

譯者責任是生態翻譯學中的重要倫理原則之一,是指「譯者要在翻譯過程中、在翻譯行為中以及在整個翻譯活動中的『全責』理念,即由譯者具體負責統籌協調『翻譯群落』(人)、『翻譯環境』(境)、『翻譯文本』(本)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從而通過『譯者責任』來體現『人、境、本』關聯互動、平衡和諧的翻譯生態整體觀。」(嶽中生,2018)由此可見,生態翻譯學和傳統的譯學觀念不一樣,將研究重心從文本轉移至譯者,並強調譯者在整個生態翻譯鏈中的重要責任,因為「只有譯者或通過譯者,才能切實踐行『生態整體主義』;只有譯者或通過譯者,才能真正彰顯生態理性。」(嶽中生,2018)下文立足于生態翻譯學視域,分別從譯者翻譯的過程(適應和選擇)和譯者翻譯的策略(三維轉換)兩個方面闡述粵語文化負載詞的英譯。

(一) 譯者的「適應和選擇」

胡庚申(2008)從生態翻譯學的視域將翻譯的本質定義為「一個譯者適應于譯者選擇的不斷交替迴圈的過程」。「適應」意為譯者對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選擇」是譯者以翻譯生態環境適應者的「身份」對譯文進行的選擇。具體而言,翻譯過程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譯者需要首先瞭解並適應翻譯生態環境,同時生態翻譯環境也會對譯者進行選擇;第二階段,在譯者適應了翻譯生態環境以後,進而選擇譯文並產生了最終的譯文。以上過程映射到粵語文化負載詞的英譯過程如圖2所示。

在翻譯粵語文化負載詞的過程中,譯者在第一階段必須適應翻譯生態環境。這表現為譯者必須充分意識到以粵語文化負載詞為典型要件,對其生存狀況、歷史含義、英譯目的等等有全面且深刻的認識。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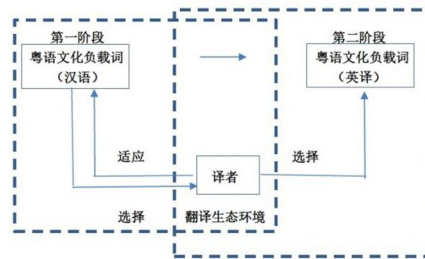


圖 2 譯者對粵語文化負載詞的「選擇與適應」

以「鑊耳屋」為例，譯者在適應原文的過程中需至少掌握以下要素：鑊耳屋是粵文化中傳統民居的代表，「鑊」在中國古代指一種大鐵鍋。「鑊耳」是指房頂牆上豎立起來的像鑊耳一樣的擋風牆，從側面看像一個凸字。鑊耳屋中的「鑊耳」部分往往用灰塑封固，工藝難度大、造價高。在古代，僅功成名就的鄉紳才有實力居住鑊耳屋，「鑊耳」也象徵了官帽的兩隻耳朵。目前許多傳統的鑊耳屋群已遭到自然災害破壞或是因保護不周而遭到拆除，不少學者已發出呼籲制定政策保護這些粵文化中的建築代表。同時，譯者也受到原文的選擇和制約。在第二階段，譯者成為典型要件，對譯文進行選擇。這表現為譯者代表翻譯生態環境選擇譯文，做出「整合適應選擇度」的選擇，尋求一個最佳翻譯。在生態翻譯學的視域下，只有「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譯文才是最佳的譯文，因為只有「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譯文才能經受得住翻譯生態環境的考驗，最終「生存」甚至「長存」下來，至此，整個翻譯生態鏈的狀態達成平衡。仍以上文中的「鑊耳屋」為例。目前對「鑊耳屋」的英譯普遍採用 Wok Ear Room；對此英譯可以肯定的是該譯文反映了譯者在第二階段裡僅在某種程度上適應並滿足了語言和原文的翻譯生態環境，這表現為譯者在英譯時強調了「鑊耳」一詞的語義，且 Wok Ear 和粵語中「鑊耳」一詞發音十分接近。然而，Wok Ear Room 這一英譯僅僅採用了音譯法，只做到了最大程度上保留了發音上的相似性，並未適應並滿足翻譯生態環境中其他重要的要素，如文化、交際、社會、讀者、委託者等，因此沒有做到「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使得 Wok Ear Room 這一英譯無法將其文化功能、交際功能發揮到最高；許多英文讀者第一次聽到 Wok Ear Room 時甚至很難進行該詞和所指建築意象上的關聯、更無法理解鑊耳屋的歷史含義。因此，Wok Ear Room 並不是一個「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譯文。綜上所述，鑒於譯者在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的適應和選擇，筆者建議將「鑊耳屋」英譯為 Ancient Cantonese Building of Stir-frying Wok Ear Style，綜合文化、社會、交際等因素，力求盡最大可能滿足最高的「整合適應選擇度」。

（二）譯者的「三維轉換」

生態翻譯學認為：「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只有真正做到『多維』地適應特定的翻譯生態環境和至少『三維』（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的選擇轉換，才有可能產生恰當的譯文。」（劉豔芳，2009）所謂「語言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是指譯者從不同方面、不同層次對語言形式進行的適應性選擇轉換；「文化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是指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不僅要進行源語與譯語之間的轉換，還要關注文化差異，儘量清除文化交流上的障礙，最終達到兩種語言文化內涵的傳遞。文化維的適應性轉換要求譯者對源語文化中的特色語言等進行相對應的處理，避免那些容易引起讀者產生誤解或使讀者用譯語文化的視角曲解原文想要傳遞的文化內涵的表達。「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是指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需要關注兩種語言的交際意圖，交際維的適應性轉換要求譯者的翻譯要體現原文的交際意圖（李帥，2015）。從某種意義而言，在英譯粵語文化負載詞的過程中，譯者只有做到「三維轉換」才能達成最高程度的「整合適應選擇度」，進而得到最佳譯文並使得整個翻譯生態鏈達到平衡。



首先,語言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在英譯粵語文化負載詞時,譯者應把握英漢兩種語言的差異和各自的語言特點,在譯文中體現目標語的語言特徵。如上文中提到的 Wok Ear Room,該英譯只是簡單地尋求從漢語到英語字到字的形式對等,然而,漢語和英語本身就屬於兩種不同的語言符號,漢字屬於表意文字,而英語則屬於表音文字,因此,Wok Ear Room 是譯者沒有恰當把握語言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的產物。又如廣州道路名「河南路」,目前對應的英譯為 South Pearl River Road。筆者認為這是一個從語言維角度而言,適應性選擇轉換較成功的譯文。譯者在英譯過程中,適應了原文中「河」一字所指的生態翻譯環境,在轉換成英文時跳脫了字面對等,並從語言維的角度在譯文中做出了適度的補償,準確傳遞了原文中「河」字所含的語義所指。

其次,文化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文化是翻譯生態的主要規範環境,翻譯要在文化中發展,就會受到文化環境中多種生態因素的影響」。(許建忠,2009)對於粵語文化負載詞而言,和其他詞語相比,文化負載資訊本身就是其最重要的特徵,因此,譯者必須注重文化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以粵語文化負載詞「灰塑」一詞為例,目前其英譯有 clay figure, plaster sculpture, clay sculpture, plaster moldings。然而這些譯文並沒有做到文化維的選擇性適應轉化,無法在譯文中再現其文化負載資訊。在英譯「灰塑」一詞之前,譯者必須適應其翻譯生態環境,瞭解「灰塑」是粵文化中的民間傳統美術,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它是嶺南地區的一種傳統建築裝飾工藝;「灰塑」中的「灰」指三種原料:一是「草筋灰」,由幹稻草和石灰膏混合;二是「紙筋灰」,由玉扣紙和石灰油混合;三是「色灰」,由製作好的紙筋灰摻入顏料;以上三種原料加紅糖和糯米攪拌後,摻入鐵線、沙子和鐵釘,即為「灰塑」的材料。譯者在選擇譯文時,必須從文化維轉換出發,可以考慮採用音譯、意以加注釋的方式將其譯為 Traditional Cantonese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of Hui Molding (Hui means a comprehensive material which contains lime, dry haulm, hand-made paper, glutinous rice power, brown sugar, sand, iron wire, nail and so on.)。對於粵語文化負載詞的英譯,譯者更應該意識到自己的譯者責任,重視文化維的適應與轉換;否則,這就是譯者的一種「瀆職」表現。

最後,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由於漢英兩種語言承載的文化又巨大差異,東西方人們的意識形態、社會制度、思維習慣和宗教文化等也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有時譯文讀者的文化系統或認知結構中找不到與源語文化相同的表達,這就給跨文化交際造成了很大的障礙。(張麗紅、劉祥清,2014)因此,譯者在英譯粵語文化負載詞時應關注語言形式的適應性轉換的同時,也應關注漢、英兩種語言文化內涵的闡釋和交際意圖的傳遞,並運用靈活多樣的翻譯方法去適應原文的交際意圖、選擇符合譯語表達和交際的譯文。「如果將翻譯本身作為目的,則翻譯就是一個整體的交際過程,即原來的單語交際過程擴展為包含譯語接收者在內的雙語交際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存在著能夠在沒有任何額外補充(注釋、釋義等)的情況下使人洞察原文的認知意義、語言形式和交際功能(張杏玲,2018)。以粵語文化負載詞「沙灣飄色」為例,它是粵文化中傳統的民俗活動,距今已有 100 多年的歷史。「沙灣」指廣東沙灣鎮;據說清朝咸豐年間,廣東各地的流浪藝人會在酬神廟會期間,打扮成戲曲中婦孺皆知的人物造型,展現神話和歷史典故等,進行巡遊表演。(盛海輝,2008)巡遊隊伍會呈現出立體的舞臺,凌空而起的人物造型為「飄」,浩蕩的巡遊隊被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稱為「飄色」。「沙灣飄色」一詞體現了傳統的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特點,即擅長形象思維,「在思維時重視直覺、體驗、類比和象徵,善於把不同的東西結合在一起,然後進行整體性思維。這種思維方式與西方重視理性和邏輯的思維方式有明顯區別。」(秦曉華,2016)直覺體驗源自人體的五官感受,尤其是視覺和聽覺。「飄色」一詞就是以直覺體驗的命名表現。目前,「沙灣飄色」的英譯之一為 Sha Wan Floating Colors,從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來看,該譯文沒有考慮到漢英兩種語言的思維方式差異,如果不作必要的額外補充注釋和釋義,譯文必定為跨文化交際帶來阻礙。筆者建議考慮到英語思維方式的特點,並兼顧文化維和語言維

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可將其英譯為 Historical Action Figures Parade of Sha Wan。

四、結語

生態翻譯學在現有譯學理論研究的局限性與缺失性的大背景下,借助中國古代生態智慧靈感、相關領域學科以及譯學界生態取向的發展應運而生,將它運用于粵語文化負載詞的英譯彰顯了東方生態智慧和西方生態哲學的完美結合,也彰顯了中國作為歷史文化悠久的文明古國生生不息的力量;同時,依託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的背景,生態翻譯學視域下的粵語文化負載詞的英譯勢必能為加強人文交流、促進文化繁榮發展、推進區域旅遊發展提供可參考的理論範式。譯者在踐行文化負載詞的英譯時,應意識到譯者責任,適應原文的生態翻譯環境,對粵語文化負載詞的英譯從「三維轉換」的角度進行選擇,進而使得譯文在整個生態翻譯環境中「適者生存」,也使得整個生態翻譯鏈達到平衡。

注釋

- ① 許國璋: *Cultural loaded words and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現代外語》,1980年第4期。
- ② 嶽中生著:《生態翻譯學理論應用研究》,北京:水利水電出版社2018年版。
- ③ 胡庚申:《生態翻譯解讀》,《中國翻譯》2008年第6期,頁11-15。
- ④ 劉艷芳:從翻譯適應選擇論看新聞報道中隱喻習語的翻譯,《上海翻譯》,2009年第4期。
- ⑤ 許建忠著:《翻譯生態學》,北京:中國三峽出版社,2009年版,頁42。
- ⑥ 秦曉華:《南海諸島礁名稱的中國傳統文化內涵及其意義》,《南海學刊》,2016年第2期。
- ⑦ 張麗紅,劉祥清:《生態翻譯論對外宣翻譯的啟示》,《中國科技翻譯》,2014年第2期。
- ⑧ 張杏玲著:《生態翻譯學視域下彝族文化的外宣翻譯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版,頁119。
- ⑨ 李帥:《生態翻譯學指導下的〈飲冰室文集點校〉(節選)翻譯報告》,北京交通大學2015年碩士學位論文。
- ⑩ 盛海輝:《沙灣飄色》,《中國老區建設》,2008年第6期
- ⑪ 中國知網: <https://kns.cnki.net/kns8/defaultresult/index>
- ⑫ http://www.baiyundshan.com.cn/bysen/introduction/list_tt.shtml
- ⑬ <http://www.gz.gov.cn/guangzhouinternational/visitors/whattodine/snacks/>
- ⑭ CHEN Dongyan & TANG Guoping. (2021). The C-E translation of Guangxi ethnomedicine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translatology: Take the selected edition of Zhuang medicine as an exampl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1(3), 190-196.
- ⑮ YU Yesheng. (2021). A study of Authur Waley's *The Nine So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1(2), 39-49.

(Editors: KCJ & JIANG Qing)